

绪 论

本书所说的“中国近代”是指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期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思想领域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

第一节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 近代哲学革命

中国封建社会自明代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清之际的一些大思想家，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特别稳固，封建统治力量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步履艰难，因而民主主义思想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遭到了摧残。所以，中国尽管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却一直未能像欧洲那样迅速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逐步地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了解体作用，而对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则起了促进作用。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

中国，并不是要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国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相勾结，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新的阶级，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出现了。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再加上后来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于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便造成了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国近代的革命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五四”以前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五四”以后则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就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本书要论述的就是自1840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 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

我认为，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①这可以看作是对哲学史下的一个定义。所谓根源于社会实践，是说社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社会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政治思想斗争这一环节来实现的，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自然科学这一环节来实现的。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它们统一于社会实践。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在革命的时代，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影响更显著一些；而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科学的进步与哲学的关系就显得更重要一些。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着重考察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而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忽视科学的进步对哲学的影响。

那么，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怎样通过政治思想斗争来制约哲学的演变的？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

见笔者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关于“古今中西”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

当然，对“古”和“今”、“中”和“西”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同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几个概念也有不同的含义。近代一开始，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向西方学习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他认为，中国的“道”是用不着变的。后来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是指学习西方的技术。严复认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无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论世变之亟》）。在他看来，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实际上是一回事，中学与西学，好古与力今，是不可调和的。他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与外交报主义书》）在严复那里，中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西学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文化，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五四”时期展开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胡适等人赞成“西化”，实即主张资本主义化，梁漱溟、张君勱等人强调继承中国儒家的传统，则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他们各执片面，都是形而上学观点。孙中山则随着时代前进，起初主张学习西方的革命民主主义，后来又强调“以俄为师”。所以，在孙中山那里，“西”的具体内容是在发展的。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西

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但也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使它中国化，取得民族的形式。至于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则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抵制帝国主义的腐朽的东西。对“中”也要具体分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必须继承和发扬，而对于封建性的糟粕则非坚决推倒不可。以上说明，“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是在变化着的。但不管怎样变化，它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而经历了千辛万苦，确实是可歌可泣的。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是革命家，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热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一“古今中西”之争又制约着哲学的发展。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因此历史观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同时，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便付之于实践，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近

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论争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的。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哲学革命就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二、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

从哲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的关系来考察中国近代哲学，就既要注意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也要注意它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但这种思想联系却因各家各派见仁见智而颇为不同，因此这方面也有“古今中西”之争。一般地说，凡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先进思想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真正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两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它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联系着。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时期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的革命者都信奉进化论。而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找到了马克思主

义，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其影响虽然不能与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但也要作具体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有两种：一是实证论的思潮，二是非理性主义的思潮。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等，属于实证论的流派。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以及克罗齐等，属于非理性主义的流派。在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中间，有些人是认真研究学术的，而且还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东西。例如罗素，他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在数理逻辑上有划时代的贡献。罗素的逻辑，通过金岳霖的介绍，在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这一点应该肯定。当然，他的唯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通过梁启超、张东荪等）也有消极的一面。所以对罗素哲学要一分为二。同时，外来的哲学理论传到中国来，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固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但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就是说，不仅仅取决于外来的东西本身，而且取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如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它们在中国近代是颇有影响的。对这种影响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一些先进的人物也介绍过它们，如鲁迅翻译尼采的作品，李大钊推崇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应该看到，尼采、柏格森的哲学在中国所起的冲击封建主义的作用，决不是它们在西方所

具有的。当然 后来梁漱溟讲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则是为了替被打倒的‘孔家店’辩护；而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宣传尼采哲学，则是完全反动的。

中国近代哲学虽然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它不可能离开中国固有的传统。所以，我们还应把中国近代哲学同古代哲学的传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首先 近代思想家大多向往着先秦儒、道、墨诸子蜂起 百家并作的局面。先秦是民族文化的‘童年时代’，它揭开了中国哲学史的光辉灿烂的一页，近代中国人又一次回顾了具有‘永久的魅力’^[1]的时代，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其次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对中国近代哲学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大思想家已经具有不少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因素。他们继承了先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些人在中国近代的革命者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人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与中国固有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有关。哲学史的螺旋式发展，总是表现为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中国近代哲学就是向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复归，向先秦复归。

再次，哲学的近代化就是对经学的否定。自汉以来，儒术独尊 形成了经学 正统派儒家用天命论和经学的独断论 权威主义 来维护名教 长期居于支配的地位。这是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近代哲学在否定经学形式和抛弃封建糟粕的同时 对经学也有其继承的一面。例

如，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近代还是继续发生影响。这种方法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与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 讲经世致用 特别是“公羊三世”说，对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陆王心学在近代的影响更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戊戌变法时期 康有为提倡心学。“五四”时期 吴虞反对封建礼教，推崇李贽。李贽的哲学是王学向左的发展，可见王学在当时还有它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后来有人用王学来为所谓“力行哲学”作辩护，那就是王学影响的消极面了。至于程朱理学，因为它自宋代以来就占统治地位，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先进人物对程朱大都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对于程朱理学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近代的积极影响，却也不能完全抹煞。

此外，佛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身上 都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欧阳竟无 在复兴佛学方面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后来汤用彤^②、吕澂^③对佛学的研究也很有成绩。佛学在中国近代复兴的原因大致有：一，佛学不讲天命而讲佛性，禅宗等流派说自心是佛，提倡自尊无畏。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为了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便主张发扬“心力”，解放个性。他们以为可以从佛学中吸取思想资料。二，从世界思潮来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叔本华哲学，是接受了印度吠檀多、佛教哲学的影响的；也可以说，他在佛教那里找到了东西文化、东西哲学的交接点。而寻找这种交接点，正是近代思想家最感兴

趣的主题之一。三，佛学在近代的复兴，最可注意的是唯识宗复兴，这与唯识宗重视因明有关。近代中国人意识到了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因此注意从佛学中去发掘因明学，并拿它同墨辩、西方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

总之，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与近代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包括两方面：从哲学根源于社会实践来说，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从哲学本身的相对独立发展来说，哲学家就是把来自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加工，来回答现实问题。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把握“古今中西”之争，便可以进而把握哲学根本问题在中国近代的表现形式。

欧阳竟无（1871—1944），居士，名渐，江西宜黄人，人称“宜黄大师”。34岁随杨文会学佛学。杨去世后，承其遗志去经营金陵刻经处，并附设佛学研究部。创立支那内学院。一生刻佛典达2000卷。著作有《竟无内外学》26种，30余卷。

- ②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曾留学美国，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学术上主要研究佛教史和哲学史，把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传统与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对玄学和佛学的关系、佛教史的发展规律、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和本末有无之争等问题，均有创见。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等。

吕澂（1896—），字秋逸，江苏丹阳人。曾在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并协助欧阳竟无辑印《藏要》三辑。改变过去仅就汉译经典进行研究的方法，利用梵、藏、巴等各种文字资料，对勘汉译经论进行研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主要著作有《印度佛教史略》、《因明纲要》、《佛教研究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

第二节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

哲学史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主要是围绕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但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中国近代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回答这一问题，仍然应该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近代哲学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演变而来的；同时，它又在一定意义上重复了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史。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史与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史有共同的特征和相似的规律性。然而，决不能忽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中国有自己的现实和传统，它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西方的历史。中国哲学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独立发展，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民族特点。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表现概括为四方面的哲学论争即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而中国近代哲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对上述的问题展开了具有近代特色的论争。这些论争与西方近代的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又是合乎逻辑地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演变出来的。

一、从道器之辩演变到进化论和唯物史观

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观的问题。这个论争演变到近代，首先就是历史观的问题，然后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问题。从历史观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呢？王夫之说：“无其器则无其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他把历史看作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律，所以人道是发展的。如何发现这些历史规律呢？王夫之说，“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说·孟子离娄上篇》）他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不能用天命和自然界现象的变异，来解释社会的治乱，而应从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势因乎时，理因乎势”（《读通鉴论》卷十二）时代条件不同了，历史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而就有不同的历史规律。这种观点，在 17 世纪，应当说是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历史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王夫之、黄宗羲以至章学诚都还不可能作出回答。

近代一开始，因为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要解决“古今中西”之争，于是历史观问题就突出了。龚自珍重新提出了“公羊三世”说。他利用旧的形式，朦胧地（不能说是明确地）试图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他还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

非极 自名曰我。’《王 癸之际胎观第一》他把众人的“自我”同天命、道、太极和圣人的权威显明地对立起来。这就有了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开端。所以，龚自珍的历史观，具有近代的气息。它揭示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即历史观领域，召唤哲学家们去探索，去拓宽和展开。不过，龚自珍还只是凭借诗人的敏感猜测到了这一点。龚自珍、魏源讲变易，都认为器是变的，而道是不变的，这也是洋务派和早期的改良派的共同观点。早期改良派对论“道器”、“体用”、“本末”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来论证改良的必要，这本来具有进步性。但后来洋务派官僚却用“中体西用”论来反对变法，这就同历史前进的步伐唱反调了。

太平天国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洪秀全要求在地上建立一个平等的、平均的“天国”。这虽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也是以一种强调变易的历史观作为理论根据的。洪秀全讲“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按物极必反的“天道”变易的。

在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首次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运》讲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以为历史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进到太平世，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康有为已经是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了。戊戌变法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谭嗣同批评“器变道不变”的理论，严复批判“中体西用”的理论，他们都以进化论作武器来反对天命史观。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他认为只有实现社会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用“力今胜古”、“日进无疆”的进化论思想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才能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主、自强、自立的信心。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先进人物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当然，在进化论的范围内，还有革命和改良的斗争。改良派认为进化是渐变；革命派则认为进化包含有跃进。但二者都讲进化论，这一点是相同的。

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它以近代的科学（首先是生物学）为根据。在自然观上，进化论是唯物论的。它把人类社会看作为自然发展的产物，看作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也是合理的见解。当时一些革命者以进化论作武器，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但是，以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演变，归根到底是不科学的。他们把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或者归之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归之于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的互助合作。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真正科学地解释历史的进化，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回答“古今中西”之争。为了探索历史进化的动因，梁启超已开始考察群体意识，明确地提出了历史领域中的心物关系、群己关系问题。章太炎用“竞以器”来解释群的起源，可以说已有了唯物史观的端倪。从哲学革命来说，进化论这个阶段是重要的，它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

进化论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就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首先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历史观上的心物之辩突出了。通

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一系列论战，唯物史观战胜了“五四”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实用主义和柏格森哲学等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就深入到群众革命斗争中去，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具体地分析中国的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终于找到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观不能脱离一般的发展观，不能脱离宇宙观。在革命阵营内部，有的人片面强调斗争，有的人片面强调联合、统一，有的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不懂得革命要分阶段，有的人片面强调革命的现阶段，不懂得革命的转变。这种片面性是产生“左”、右倾错误倾向的认识论根源。在批判了这些“左”、右倾错误思想并克服了它们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取得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理论上来说，这也就是实际地而不是抽象地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辩证发展观。辩证发展观肯定一切事物由于其内部矛盾而引起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这也可说是传统的“体用不二”、“道在器中”的思想的发展。

这是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由历史变易观对“道器”、“本末”、“体用”关系的考察，进而发展到进化论，再发展到唯物史观以及一般的辩证发展观。这就使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显现出阶段性来。进化论、唯物史观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它们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相结合了，都有了中国的特色，这显然是中国哲学合

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二、关于认识论上的‘心物(知行)’之辩

“心物(知行)”之辩是唐宋以来中国哲学论争的中心之一。近代哲学讲认识论，仍然以此为论争中心。它与“古今中西”之争密切联系着，有了近代的特点，并逐渐和历史观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结合在一起了。

以往在心物(知行)之辩上，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呢？王夫之从唯物主义出发，讲“行第一”和“知行相资以为用”，即认为知行两者互相依赖，互相作用，但行是第一位的。他把格物和致知看作是认识的两个阶段，互相促进，不可分割。他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把认识过程了解为知和行、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应该说，这在古代是很高的成就。不过，古代哲学家讲的“行”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实践；他们讲认识的辩证法，还具有朴素性质，缺乏近代实证科学的论证。

近代伊始，魏源重新对知行问题作了考察。他说：过去的诗人发愤而写诗，《易经》的作者有忧患而著述；“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海国图志叙》）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引起人们的愤和忧，促使人们发愤图强，要觉悟过来，不要沉沉昏睡，要多做实际工作，不要空谈。魏源反对理学空谈性理，也不满汉学专搞训诂，他非常注重实践、观察，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默觚上》。

学篇二》)。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他强调要广泛地做调查研究,要考察群众的意见,他说:“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下·治篇一》)他所说的注重“实事实功”,也包括向西方学习技术、学习船坚炮利。显然,这种态度已颇不同于传统经学的权威主义。魏源讲知行关系问题,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密切联系着的,具有了近代的气息。

后来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都探讨了知与行的问题。

一般说来,改良派强调知,以为首要的问题是开民智。严复说:“民智者,富强之源。”他在认识论上主张知先于行,又有经验论的倾向。而革命派则强调行。章太炎提出“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的命题。他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话包含有社会实践观点的萌芽,是可贵的。他在认识论上主张行先于知,不过又有思辨哲学的倾向。但是**学本论**是严复还是章太炎和孙中山都没有真正解决知与行、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的关系问题。

从“五四”时期到 30 年代,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仍然是各自强调认识过程的某一环节,导致了唯心主义。胡适讲实用主义,这是经验论;梁漱溟讲王学和柏格森主义,这是一种直觉主义;冯友兰讲新实在论、新理学,比较强调逻辑思维。他们分别夸大了认识过程中的经验、直觉、意欲或理智、思维的环节,却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只有金岳霖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他在《知识论》中比较辩